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先秦诸子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先秦诸子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选修/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教育研究所编著.—2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2（2018.6重印）

ISBN 978-7-107-19105-3

I. ①普… II. ①人… ②课… ③北… III. ①中学语文课—高中—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5165号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先秦诸子选读 教师教学用书

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益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2月第2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23次印刷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330字

定 价 34.90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
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电话：400-810-5788



这套《教师教学用书》是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选修）》相配套的，目的是帮助任课教师掌握和使用教科书，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册是与《先秦诸子选读》配套的，供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参考。

《先秦诸子选读》共七个单元、二十六个小节，任课教师可以用28个课时完成讲授，另外用8个课时组织、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活动，包括讨论乃至辩论等；建议作为选读材料的五个小节（章节前标有“*”），老师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大块：

一、“课程说明”部分，关系到整个课程的进行，并且提供了关于整个课程的方方面面的材料，包括先秦诸子的一般历史背景、诸子哲学发达的直接历史原因、诸子思想总评（侧重于儒墨道法四家）、诸子文章总评、先秦学术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哲学的特色等，作为整个课程的参考。

二、在每一个单元的前面均有“单元说明”，内容主要包括“教学目标”“单元介绍”“教学建议”“有关资料”四个部分，提示各单元的具体教学目标和内容，并且提供任课教师进行各单元教学活动时需要了解的知识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是开展各单元教学活动的参考。

三、对教科书每一小节的内容，本书先以“重点、难点”部分，列出各小节应该讲授的主要选文（不在讲授之列的可适当安排学生自学），并且从选文思想内涵、文章写作、字汇等方面提示教学活动的焦点所在。接下来“选文解读”部分，对列入讲授范围的选文进行讲解论析，既关照选文的内容，又关照选文的表达形式，还关照文章阅读鉴赏乃至语汇等各个方面。再接下来“问题探究”一项（有的小节有，有的小节没有），提供跟该小节内容相关的拓展性问题及其参考答案。“思考与练习解题思路”一项，则提供教科书中思考和练习题的解题思路或参考答案。“有关资料”部分，汇集了该小节选文的相关评论，评论者有古人也有今人，评论内容或侧重思想内容，或侧重写作艺术，或二者兼而有之。（评议材料若引自今人的著作，一般都注明版本；若引自古人的著作尤其是线装书，一般只注明书名。有的评议材料下面没有注明出处，是因为它与下面一条评议材料出于同一本书。比如，第七单元第二节第1、2、3、4条评议材料，跟第5条评议材料都出自中华书局《韩非子精华》，则仅在第5条材料下注明，以节省篇幅）最后是“参考译文”部分，包括了全部选文的参考性翻译。以上各项，是进行每一小节教学活动的参考，也是本书的主体内容。

本书跟教科书内容并不重复，而是互相照应。任课教师可以把两书配合起来使用，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另外，任课教师也可以围绕教学用书及教科书的各项材料，大胆地去重新组织教学内容，开展教学活动，但最好不要背离本课程的宗旨。

对于多数高中学校来说，开设语文选修课还是个新鲜事物。我们编写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师教学

用书》，也只是初步尝试。因此，我们迫切希望老师们把这套选修课教科书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对这套《教师教学用书》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告诉我们，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主编：常森；责任编辑：孙瑞雪；审稿：聂鸿飞、熊江平。

编者
2005年8月

目 录

附录《千字》 单元五第

课程说明	(1)
------	-----

第一单元 《论语》选读

单元说明	(11)
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21)
二、当仁，不让于师	(27)
三、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33)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8)
五、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45)
* 六、有教无类	(49)
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54)

第二单元 《孟子》选读

单元说明	(58)
一、王好战，请以战喻	(63)
二、王何必曰利	(70)
三、民为贵	(75)
四、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80)
* 五、人和	(85)
六、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91)
七、仁义礼智，我固有之	(95)

第三单元 《荀子》选读

单元说明	(100)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104)

第四单元 《老子》选读

单元说明	(116)
有无相生	(120)

第五单元 《庄子》选读

单元说明	(125)
一、无端崖之辞	(131)
二、鹏之徙于南冥	(136)
* 三、东海之大乐	(145)
四、尊生	(150)
五、恶乎往而不可	(156)

第六单元 《墨子》选读

单元说明	(163)
一、兼爱	(166)
二、非攻	(172)
* 三、尚贤	(176)

第七单元 《韩非子》选读

单元说明	(181)
一、郑人有且买履者	(184)
* 二、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	(190)

课程说明

Ke Cheng Shuo Ming

教学目标

“先秦诸子选读”这一课程不是一般的知识型课程，宗旨是通过向学生讲授先秦诸子的一些经典选文，启发和引导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提高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加深学生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学生阅读和分析古文的基本功，培养学生把握社会、人生问题的能力。

教学内容

先秦学派众多，向来有九流百家之说，正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其中“卓然自树壁垒”的，则是儒、墨、道、法四家。本课程就从这四家的七部经典即《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之中，选择重要的篇章，组织成一系列专题，向学生讲授。这些专题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生智慧，是各家最重要的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并且具有巨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教学建议

1. 在开课之初，让学生结合课程学习，阅读教材概说部分以及各单元前面的诸子简介，并且预习课文。
2. 不能在课堂上讲授的选文，可以作为泛读材料，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自学。
3. 建议任课教师在开讲前阅读下面的材料。这些材料对了解先秦诸子产生的社会历史土壤、把握教材中各篇选文的艺术价值，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在讲授各篇章内容时，可随时参考这些材料。

有关资料

1. 先秦诸子产生的一般历史背景

先秦诸子活动的独特历史舞台即春秋战国时代。

自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 476 年止，大约三百年时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经过无休止的兼并，周初号称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到春秋时候只剩下了一个多。其中比较大的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几个，最大的则是齐、晋、秦、楚。平王东迁的时候，王室已大大衰落，已没有力量从政治、经济上控制天下诸侯了。列国争雄的时代由此开始了。

晋文侯（前 780 年—前 746 年在位）和郑武公（前 770 年—前 744 年在位）因为帮助平王迁都，做了平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前 743 年—前 701 年在位）继续做王室的卿士。郑国在政治上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便利，在经济方面也比其他诸侯发达，再加上实行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策略，以几次胜利大振声威，使齐鲁两国听从指挥，宋国归服，而卫国讲和。因此，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但是郑庄公死后，郑国因为内乱而中衰。他开创的有利形势遂付诸东流。

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旋即任命有远见卓识的管仲为相。管仲实施了一系列变革。内政方面的主要措施有：改变由社会变动导致的士、工、商、农流动杂处的局面，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把政治组织形式和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以加强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向法制方向迈进，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世卿世禄制度，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创造条件；对全国的山林河泽实行统一管理，把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等等。齐国社会和经济飞速发展，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在外交方面，管仲辅佐齐桓公拉拢宋、鲁，争取郑国，救邢存卫（当时邢、卫遭受狄人的侵伐），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提高了齐国在中原各国的威信。公元前 651 年，齐国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家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开会，齐桓公成为中原各国的霸主。他联合黄河中游的诸侯国，一方面北御戎狄，一方面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也从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各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公元前 643 年桓公死后，齐国也发生内乱，其霸主地位随之衰微。

此后，宋襄公（前 650 年—前 637 年在位）图霸失败。公元前 636 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晋国公子重耳在秦国援助下，回国即位，这就是晋文公。晋文公举贤任能，勤理军政，实行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使晋国大治，打下了创立霸业的基础。就在晋文公执政的那一年，周襄王之异母弟王子带联合狄人攻打襄王。王师大败，襄王出居郑国避难。次年，襄王派人向秦、晋求援。晋文公出兵打败了狄人，活捉了王子带，并把他交给周襄王，襄王将他处死；另外还护送周襄王回到了京都。这无疑提高了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当时，鲁、郑、宋屈服于楚，齐国中衰以后也受到楚国的威胁。公元前 632 年，晋国联合秦、齐、宋，出动兵车七百乘，与楚国大战于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这是春秋前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结果晋国获得了胜利，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上的势头被有力地遏制。这样，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于是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不过从文公以下，晋国的霸业都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齐桓公维护邦国制度、防止诸侯内矛盾和危机发生的霸主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到公元前 541 年，晋、楚会盟，晋国执政赵鞅的言论，正式宣告了会盟共存的时代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

公元前 628 年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前 659 年—前 621 年在位）试图向东扩展秦国的势力，但东进的道路为晋国所扼，于是就向西方戎狄地区发展，遂霸西戎。不过晋国尽管遏制了秦国东进的步伐，却无力抵御楚国北上的势头。公元前 613 年，楚庄王即位（在位至公元前 591 年），没过几年就问鼎中原。晋、楚争霸，公元前 597 年大战于郟（今河南荥阳东北），晋军惨败。鲁、宋、郑、陈都归服了楚国。

公元前 589 年，楚庄王已死，可楚国仍能召集十二诸侯会盟，连秦、齐两个大国都曾经到会，可见它势力之大。春秋时代，楚先后兼并的国家有十几个，它因此成了疆土最大的国家。

由于晋国中衰，往常和它站在一边的齐国逐渐怠慢起来。公元前 589 年，晋、齐战于鞌（今山东济南西北）。齐师战败，晋国重新加强了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嗣后厉公、悼公时期（分别于前 580 年—前 573 年、前 572 年—前 558 年在位），晋国在跟楚国的相持中略占上风，郑国转向了晋。

从齐桓公称霸以来，百余年间，各大国为了争霸不断杀伐，中小国家一方面要贡纳财物，一方面又深受战争之害。地处晋、吴、齐、楚交通要道之间的宋、郑两国，被大国争来夺去，吃尽了苦头（在晋、楚近百年的争霸斗争中，郑国参与大小战争有七十余次，宋国也有四十余次）。因此，宋国执政者几次发起弭兵即息兵、停止战争运动。公元前 546 年，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邾、滕等十几个侯国的卿大夫或小国君主，在宋都商丘举行弭兵盟会，约定晋的附属国要朝贡楚，楚的附属国要朝贡晋；而齐作为晋的盟国不朝楚，秦作为楚的盟国不朝晋。邾、滕分别作为齐、宋的附属国，不参与盟会。这次会盟之后，晋、楚两国在四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冲突，战争的中心于是由中原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楚和吴越之间。可是，晋、楚两国的附属小国不得不承认它们作为共同霸主的地位，既朝晋，又朝楚。它们固然免受了大国的征伐，但人民的负担未减反增，贡纳比以前多了一倍。

弭兵会盟是由诸侯争雄转向大夫兼并的关键，也是春秋时代进入后期的标志。随着各国公室衰弱，而大夫势力增强，中原各国逐渐由过去国与国斗争转向了国内斗争。一些侯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旧制度逐渐为新制度代替。中原各国的内政下移到卿大夫手中，形成了大夫专政的局面。从晋文公称霸后到春秋末年，晋国过去的几十家卿大夫只剩下了知氏、范氏、中行氏以及韩、赵、魏六家，即所谓“六卿”；他们长期掌握着晋国的实际政治权力和广大土地。齐国的世卿大族比晋国要少一些。公元前 554 年，崔杼立齐庄公，得政；接着庆氏灭崔氏，接着陈氏、鲍氏联合栾氏、高氏共灭庆氏，接着陈氏联合鲍氏灭掉了专权的栾氏和高氏。最终，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从陈国逃到齐国的陈氏逐渐强大，为代齐奠定了基础。鲁国秉承周礼，由公族执掌大权。公族中最强的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之后，所以常被称为“三桓”，而季氏尤其强盛。公元前 561 年，季武子执政，大权尽归季氏。公元前 517 年，鲁昭公受不了季氏的凌逼，起兵攻袭季氏。但季氏在叔、孟两家的帮助下，把昭公赶出了国都，他终身都没能回来。季氏代行君权有八年之久。郑国掌握大权的也是公族，子罕、子驷、子皮、子产等先后执政。大抵说来，在跟国君和其他大夫的较量中，最终赢得胜利的那些执政大夫都从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公元前 475 年，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到公元前 221 年秦完成统一为止）。

经过互相兼并，晋国卿大夫到春秋末年只剩下“六卿”；进一步互相兼并的结果，则是只剩下了智氏、赵氏、韩氏和魏氏，赵、智两家较强；再进一步互相兼并，公元前 453 年，赵、韩、魏联合灭掉了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土地。晋君土地人民所剩无多，名存实亡，苟延残喘而已。公元前 403 年，周威烈王正式加封三家为韩侯、赵侯和魏侯。因为韩、赵、魏三国原本是晋国的三家大夫，所以常被称作“三晋”。而在齐国，公元前 481 年陈恒弑简公，掌握了大权。陈恒曾孙为田和（也就是陈和，“陈”“田”古音相同），为齐宣公相。宣公死后，田和立其子，为齐康公。公元前 391 年，田和把齐康公迁到海边。公元前 387 年，田和与魏武侯相会，正式把自己列为诸侯。第二年，周天子封他为齐侯。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是新兴封建势力与旧势力斗争的缩影。经过一系列分化或兼并，春秋时代一百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记载的大约有十几个。其中大国有秦、齐、楚、燕、韩、赵、魏，通常称为“七雄”。各国相继实行了变法。魏文侯（前 445 年—前 396 年在位）任用李悝，楚悼王（前 401 年—前 381 年在位）任用吴起，齐威王（前 356 年—前 320 年在位）任用邹忌，韩昭侯（前

362年—前333年在位)任用申不害,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在位)任用商鞅,各自开展了变法革新运动。他们推行的主要措施有:实行君主集权,打击旧贵族,破除世卿世禄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奖励耕战,严明法度,整顿吏治,强调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等。其中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使秦国富足强大,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战国七雄都想通过战争来吞并其他国家。自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以后,魏国日益强盛;经武侯至惠王(分别于前396年—前371年、前370年—前319年在位),实力已是无与伦比。所以战国初期,在魏国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北边的赵,没有不被它侵略的。公元前344年,魏自称王,还召集宋、卫、邹、鲁、秦举行会盟,并同各国国君或官员去朝见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考王(前440年—前426年在位)以后,周室残余的王畿分裂为东、西两周,周天子沦落为一个挂名的共主,既不能指挥诸侯,又不能直接领有王畿。公元前341年,齐威王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臧为军师,以十万大军,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围歼了魏国的精锐部队。嗣后魏国只能自守,甚至到了不得不割地事秦的地步(商鞅变法后,秦国已日渐强盛)。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纳相国惠施联合齐、楚的建议,率领韩昭侯和其他小国国君到齐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并且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称认魏惠王的王号。公元前325年,即魏、齐徐州相王后的第九年,秦、韩相继称王。公元前323年,赵、燕、中山也开始称王。

为了达到目的,各大国纷纷谋求盟国,开始了合从(纵)连衡(横)的运动。什么是合纵、连横呢?战国时候,西方的秦国跟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联合,叫“连衡”(东西为横);东方的六个国家共相结合,叫“合从”(南北为纵)。自从魏国衰落以后,东方六国中能跟秦国抗衡的就只有楚和齐了,特别是楚。当时有一种说法:“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但由于东方各个国家都伺机侵夺别的国家,再加上秦国忌惮合纵的成功,极尽破坏之能事,所以东方诸国“合弱而不能如一”(《战国策·燕策二》)。秦国一方面迫使魏、韩屈服,一方面反复诱使楚怀王(前328年—前299年在位)与齐国绝交,连创楚国,占领了楚国大片领土,又使它屡屡损兵折将。楚怀王客死于秦,而楚国大衰。此后,齐、秦两国在列国中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但为了各自的目的又时时有所联合。它们不断侵扰韩、魏、宋、赵等国家。齐灭宋,割楚国淮北之地,侵扰三晋,甚至打算吞灭西周。反复折腾,使国力大大损耗。宋灭之后二年(前284年),燕国联合秦与三晋等,大举伐齐。乐毅率师攻入齐都临淄,并很快攻下七十余城。除了莒和即墨以外,齐的郡县都成了燕的郡县,齐国领土只剩下五分之一。公元前279年,齐人田单用“火牛阵”打败燕军,把燕兵驱逐出境。然而齐国再也不是足以充当秦国的劲敌了。

公元前260年,秦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一带跟赵军大战。赵军惨败,全军四十多万人全被俘虏。秦将白起只让二百四十来个年少体弱的人归赵,将其余的全部坑杀。楚、齐衰落后,东方诸国中还算比较强大的赵国从此也衰落了。东方的国家没有哪一个能够单独抵御秦国的进攻了。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周天子及西周君同时亡国;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同年楚灭鲁;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军大败赵军,虏赵王,赵公子率宗族几百人奔往代郡,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代;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由于各国人民都渴望脱离战乱的苦海,而秦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它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从春秋到战国,除了上述沧海桑田的巨变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然按照宗法制度进行分封,受封的多是贵族出身的卿大夫,封地多少依所封等级的高低来定。而战国时代,郡县制普遍建立,封君制度虽然没有被彻底废除,却只是跟郡县制相辅而行。春秋时期,卿大夫在其封土内几乎跟国君一样,有经济、政治和征兵的权力,封土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封君在食邑内,除

享受衣食租税外，只有收取工商业税的权力，很少世袭。春秋时期，“国人”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西周社会的平民阶级本来有“国人”和“野人”亦即“庶人”的差别，到了春秋时期，“国”“野”以及“国人”“野人”的差别逐渐泯灭，原来的“野人”已经混同于“国人”，其社会地位已经与“国人”相同了）。“国人”不仅要向国家缴纳赋税，而且要服兵役、纳军赋，是跟国君贵族鼎足而立的势力，可以影响国君的废立、外交的和战、国都的迁徙等等；当然，他们只是能通过舆论来影响政治而已。在春秋时期，公社农民使用的土地由以前的定期分配走向固定化，但是公社并没有解体，公社土地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过渡到私有制。此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奴隶，大多数是为官府所有，从事手工业，或者做贵族家内的劳动者。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崩坏，公社农民自耕的土地即“私田”变成了私有土地，于是出现了一个“自耕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极盛时期，造就了农业和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然而，由于沉重的租税徭役负担以及高利贷的严重盘剥，农民或者失去了土地而成为他人的雇佣者，或者弃产流亡甚至饿死在沟壑当中，或者做豪强地主的佃农，或者沦落成奴隶。而伴随着土地买卖而来的土地兼并，许多贵族以及其他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则逐渐转化成了地主。战国时期，作为统治工具，以相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吏机构取代了以前由卿大夫同时掌握政权和兵权的体制，官吏的俸禄制度代替了食邑制度；将相制度、郡县制度、封君制度、俸禄制度等各种制度的确立，使一整套官吏机构层层控制，并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形成了君主专制的国家机构。此外，一系列关于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制度，也陆续建立起来了。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末年，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就活跃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

（主要根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编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子学时代”哲学发达的原因

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其所以能有此特殊之情形，必有其特殊之原因。兹分述之。

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上，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盖上古为贵族政治，诸国有为周室所封者，有为本来固有者。国中之卿大夫亦皆公族，皆世其官；所谓庶人皆不能参与政权。《左传·昭七年》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有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古代政治上为贵族世官世禄之制，故社会组织上亦应有此种阶级也。贵族政治破坏，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贵族政治之崩坏实当时大势之所趋。此在春秋之时已见其端，故宁戚以饭牛而得仕于齐，百里奚以奴隶而仕于秦；此庶人之升而为官者也。《诗》有黎侯之赋《式微》，《左传》谓：“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为皂隶。”（《左传·昭公三年》）孔子本宋之贵族，而“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此贵族之降而为民者也。如是阶级制度，遂渐消灭，至汉高遂以匹夫而为天子，此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之根本的变动也。

与贵族政治连带之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七年》聃尹无宇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所谓王土王臣，在后世视之，只有政治的意义，然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实兼有经济的意义。上所述社会上之诸阶级，亦不只是政治的、社会的，而亦且是经济的也。盖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天子、诸侯及卿大夫，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皆为人民之主。例如周以土地封其子弟为诸侯，即使其子弟为其地之君主兼地主也。诸侯再以其地分与其子弟，其子弟再分与庶人耕种之。庶人不能自有土地，故只能为其政治的经济的主人作农奴而已。《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之政治，皆不过有数几家贵族

之活动；所谓人民者，但平时为贵族工作，战时为贵族拼命而已。……史谓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汉书·食货志》）。此农奴解放后“民”之能崛起占势力为大地主者也。所谓井田制度之崩坏，亦当时之普通趋势，不过商鞅特以国家之力，对之作有意识的、大规模的破坏而已。

其次则商人阶级亦乘时而占势力。《汉书》曰：

及周室衰，礼法堕。……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富者土木被文锦，犬马余肉粟。……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汉书·货殖传》）

此所谓“王制灭”，“礼法堕”，故庶人崛起而营私产，致富豪。然若就经济史观之观点言之，亦可谓因农奴及商人在经济上之势力，日益增长，故贵族政治破坏，而“王制灭”，“礼法堕”。商人阶级崛起，弦高以商人而却秦存郑，吕不韦以大贾而为秦相，此资本家之与当时政治外交发生直接关系者。总之，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也。

此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已往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少可以比之者。故此时期诚中国历史中一重要时期也。

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予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

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反对一切制度者。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予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

孟子……庄子……《汉书·艺文志》……所谓“圣王不作”，“贤圣不明”，“王道既微”，即指原有制度组织之崩坏也。因此崩坏，故“道德不一”，故“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我国大思想家之出现，实在西纪前 530 至 230 之三百年间。吾命之曰全盛时代……此时代全社会之变化，至迅且巨，所以能孕育种种瑰伟思想者，半由于此。吾深感有详写背景之必要，为资料及本书篇幅所限，仅略分前后两半期从政治、社会、学问三方面简述崖略云尔。（前半期指本时代之前一百年，后半期指后二百年）

甲、政治方面。

一、封建制度。在前半期已届末运，并霸政亦衰熄，兼并盛行，存者殆不及二十国。至后半期遂仅七国并立，最后以至混一。

二、贵族政治。与封建同其命运，强族篡国，摧残余宗，内中惟秦国自春秋以来，始终未用贵族，卒以此致盛强。故各国争效之。入后半期而特种阶级完全消灭，所谓“世卿”者已无复痕迹。纯为布衣卿相之局。

三、经前此数百年之休养交通，境内诸民族同化已熟，畴昔所谓夷狄——如秦楚吴越等，悉混成于诸夏；其境上之异族——即后此之匈奴东胡等，悉攘逐于徼外。

四、各国境宇日恢，民众日杂，前此之礼文习惯，不足以维系。故竞务修明法度，以整齐划一其民。

五、既无贵族，则权集于一，成为君主独裁政体，而权威之滥用，势所难免。

六、后半期约二百年间为长期战争，各方面交起，因兵数增加兵器及战术进步之故，战祸直接间接所被极烈。

乙、社会经济方面。

一、各国幅员既广，又统于一尊，于是大都会发生。如秦咸阳、齐临淄、赵邯郸、魏大梁……之类，为政治、商业、文化一切之中心。其气象之博大，为前此所无。亦因人民竞趋都市生活之故，前此宗法组织，农村组织等益不能维持。

《齐策》苏秦言：“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虽不无铺张，要可见都市淳兴繁盛之概。

二、交通大开，货币盛行，经济重心由农业趋于工商业。如猗顿之以监盐，郭纵之以冶铁，乌氏倮之以畜牧，寡妇清之以穴矿，皆起氓庶与王者埒富。（《史记·货殖传》）而吕不韦以阳翟大贾，乃能运阴谋废置国王，执持国柄。（《史记》本传）盖贵族仆而富阀代兴，其势力乃至侵入政治，实开前史未有之局。

三、前此农业时代，奴隶甚少，即有之，其待遇殆与家族之一员无异。及工商的资本阶级发生，其力足以广畜奴仆而资其劳作以自封殖。而当时征敛烦苛农业荒废之结果，农夫失业，迫而自鬻。于是新奴隶阶级起，史称白圭（孟子同时人）“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以为美谈。（《史记·货殖传》）则僮仆苦乐不与齐民同者久矣。

孔子日常用事，如“冉有仆”、“樊迟御”、“阙党童子将命”、“使门人为臣”等皆见于《论语》。并不见有用奴仆痕迹。此殆当时士大夫通习，非必孔子特倡此平等制也。

丙、学术方面。

一、前此贵族阶级，即为智识阶级，自贵族消灭后……平民之量与质同时增上，于是智识下逮普及，纯带朝气以弥漫于社会。

二、前此教育为学官掌之，舍官府外无学问。至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墨子继之，其宗旨又在“有教无类”，故智识平均发展之速率益增。

子张、驹冶、颜涿聚大盗，学于孔子，禽滑厘亦大盗，学于墨子，皆成名贤。

三、列国并立互竞，务延揽人才以自佐。如秦孝公、齐威王宣王、梁惠王、燕昭王，乃至孟尝、平原、春申、信陵之四公子，咸以“礼贤下士”相尚，而“处士”声价日益重，而士之争自濯磨者亦日众。

四、大师之门“从者恒数百”。（《孟子》）而大都会尤为人文所萃。如“齐稷下常聚数万人，或赐列第为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完世家》）他国殆亦称是。智识交换之机会多，思想当然猛进。

五、当时书籍传写方法，似甚发达，故“苏秦发书，陈篋数十”。（《秦策》）“墨子南游，载书甚多”（《墨子·贵义篇》）可见书籍已甚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富，既研究有资，且相观而善，足以促成学术勃兴之机运。

以上五事，就物的基件说，更有心的基件。

六、社会变迁太剧，刺戟人类心理之惊诧及疑问，而亟求所以解决慰藉之方。故贤智之士，自能画出种种方案，以应当世之要求。

七、自周初以来，文化经数百年之蓄积酝酿，根柢本极深厚，加以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关系，思想完全解放，两者机缘凑泊，故学术光华，超轶前后。

综以上三方面十六事观之，则当时社会状况及政治思想所以全盛之故，大略可睹矣。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 诸子思想总评

春秋战国间学派繁茁，秦汉后，或概括称为百家语，或从学说内容分析区为六家为九流。其实卓然自树壁垒者，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余异军特起，略可就其偏近之处附庸四家。四家末流，虽亦交光互影，然自各有其立脚点所在，故今惟以四家为一期思想之主干。

四家思想之内容，当于次章以下分别详述，惟欲令学者先得一概念以为研究之准备，故先以极简单之辞句叙说如下：

一、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其论政治，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干涉，结果谓并政府而不必要。吾名之曰“无治主义”。

二、儒家。谓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份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又以为良好的政治，须建设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之本质，要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不断的保育，方能向上。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而于经济上之分配亦甚注意。吾名之曰“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

三、墨家。其注重同情心与儒家同，惟不认远近差等。其意欲使人人各撤去自身的立脚点，同归于一超越的最高主宰者（天）。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平等理想之上，而自由则绝不承认，结果成为教会政治。吾名之曰“新天治主义”。（对三代前之旧天治主义而言）

四、法家。其思想以“唯物观”为出发点，常注意当时此地之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之神圣。其政治论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而不容统治者以心为高下。人民惟于法律容许之范围内，得有自由与平等。吾名之曰“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

右四段以思想性质为序，试取譬于欧陆各国国会席次，则道家其极左党，法家其极右党，儒家则中央党，而墨家则中央偏右者也。至其发生及成立年代，则儒家为传统的学派，成立最早；道家成立年代大有疑问，然最早亦当在儒家后，迟或竟在墨家后；墨家成立，确在儒家后法家前；法家发生甚早或竟在儒家前，而成立则在彼三家后。此其大较也。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 诸子文章总评

读诸子者，固不为研习文辞。然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实为中国文学，立极于前。留心文学者，于此加以钻研，固胜徒读集部之书者甚远。（中国文学，根柢皆在经史子中，近人言文学者，多徒知读集，实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予别有论。）即非专治文学者，循览讽诵，亦足所祛除鄙俗，涵养性灵。文学者美术之一；爱美之心，人所同具；即不能谓文学之美，必专门家乃能知之，普通人不能领略也。诸子之文，既非出于一手，并非成于一时。必如世俗论文者之言，谓某子之文如何，固近于凿；然其大较亦有可言者。大约儒家之文，最为中和纯粹。今荀子虽称为儒，其学实与法家近；其文亦近法家。……《庄子》文最诙诡，以当时言语程度尚低，而其说理颇深，欲达之也难，不得不反复曲譬也。法家文最严肃。名家之文，长于剖析；而法家论事刻核处，亦实能辨别豪

芒。以名法二家，学本相近也。《墨子》文最冗蔓。以其上说下教，多为愚俗人说法，故其文亦随之而浅近也。（大约《墨子》之文，最近当时口语。）纵横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战国策》中，此等文字最多；诸子中亦时有之；说术亦诸家所共习也。杂家兼名、法，合儒、墨，其学本最疏通，故其文亦如之；《吕览》、《淮南》，实其巨擘。而《吕览》文较质实，《淮南》尤纵横驰骋，意无不尽，则时代之先后为之也。要之言为心声，诸子之学，各有专门，故其文亦随之而异，固非有意为之；然其五光十色，各有独壑之处，则后人虽竭力模仿，终不能逮其十一矣。以今语言之，则诸子之文，可谓“个性”最显著者，欲治文学者，诚不可不加之意也。

（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理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的因素。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颇有文学因素，而且，后代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孳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前秦说理文的影子。《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们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王介甫文取法孟、韩”。（均见刘熙载《艺概·文概》）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苏洵《上田枢密书》）。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从曹植的《髑髅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之类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像力，豪放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文学家，苏轼最得《庄子》散文的神韵，刘熙载以为苏轼诗

“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岂止是诗,东坡的文和赋,也多从《庄子》来。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启示。从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的《牡丹亭》、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灵动表现。《荀子》和《韩非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较《孟子》《庄子》稍逊。但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韩非子》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凡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

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但同历史散文一样,多少不等地包涵着文学因素,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价值。再从更大的范围,即文化史的意义来说,诸子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所不可忽视的。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评先秦学术之重要

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

6. 评中国哲学之特色

中国哲学家多注重于人之是什么,而不注重于人之有什么。如人是圣人,即毫无知识亦是圣人;如人是恶人,即有无限之知识,亦是恶人。王阳明以精金喻圣人,以为只须成色精纯,即是圣人,至于知识才器,则虽有大小不同,如八千镞之金,与九千镞之金,分量虽不同,然其为精金一也。金之成色,属于“是什么”之方面;至其分量,则属于“有什么”之方面。中国人重“是什么”而不重“有什么”,故不重知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的科学,其理由一部分亦在于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